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周边看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北京：中华  
书局，2009.6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专刊)  
ISBN 978-7-101-06636-4

I.从… II.复… III.中国—历史—研究 IV.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6731号

---

书名 从周边看中国  
编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丛书名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专刊  
责任编辑 李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次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31 $\frac{1}{4}$  插页2 字数550千字  
印数 1—2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636-4  
定价 65.00元

---

## 目录

序 .....	葛兆光	1
日本是第二个罗马(小中华)吗？18世纪德川日本“颂华者”和 “贬华者”的问题——以中医和汉方为主 .....	[美]艾尔曼	1
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	[日]夫马进	26
朱子学与王学在晚明和朝鲜的交错影响 .....	周振鹤	47
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以朝鲜的天下图和 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 .....	黄时鉴	59
“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 .....	韩东育	74
从周边看中国：三个海外华人的想象和行动 .....	梁元生	91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	[意]史华罗	106
东亚儒学与中华文化民族主义：一种来自边缘的观点 .....	[澳]梅约翰	119
日本德川学者的“夷夏之辨”思想论争内涵及其转变 .....	张昆将	126
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盛邦和	153
汉字与“言灵”：日本传统汉字论中的“执拗低音” .....	王小林	179
从《善邻国宝记》看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对华观 .....	朱莉丽、陈尚胜	198
日本《六国史》中的“唐消息” .....	王勇	210
徂徕学的“礼乐”与“中华” .....	王青	217
陆若汉及其《日本教会史》 .....	戚印平	227

其原因不言自明，他所走访的并非他地，而是“中国”自身，并非“海中文明之乡”，而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之地。

诚然，从“周边”观察的“中国”，可以看到仅在“中国”国内所无法看到的东西。然而，笔者所要进一步探求的是由“周边”观察“周边”的视点，借此亦可对“中国”重新审视，还可以说从“中国”的角度对“周边”重新审视。换言之，笔者所思考的是从不同的立场用循环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问题。

(蔡亮译)

## 朱子学与王学在晚明和 朝鲜的交错影响

周振鹤(复旦大学)

文化交流在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情况十分特殊。在很长的时期内，朝鲜在政治上是中国的藩属国，在文化上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与其他一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不同，朝鲜接受儒家文化后不但有其独特的创造性的发展，而且还对中国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反馈作用。过去我们对朝鲜汉文文献的利用不多，因此对中国文化影响朝鲜的程度感受不深，对儒学在朝鲜的独特发展了解不多，至于反馈则几无所知。近年来，朝鲜汉文典籍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使我们有必要而且有条件弥补以上的不足。

明代后期，阳明学在朝鲜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朝鲜学者的反应相当强烈，而且这种反应还及于赴朝中国学者，甚至到中国本土。于是出现了一种很有趣的文化交错现象，一方面是朝鲜学者几乎一边倒地反对王阳明，另一方面是赴朝的明朝官员积极想传播陆王之学。本文并不想对朱子学与阳明学作思想史上的价值评判，而只想利用朝鲜的汉文文献，来反映这一交错现象，以为文化交流的多种样相作一注脚。同时也想藉这些文献揭示阳明学在中国本土的流行程度，而光靠中国文献是提供不了那样生动的场景的。

### 一、朝鲜学者在中国批评阳明学

阳明先生王守仁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死于嘉靖七年(1528)。其著作在生前辑成者只有《传习录》一书，其他著述均为逝世后刊行。固然其学说在生前已经由人口头广为传播，但及于外国，必待于成书以后方能普遍广被。

不过因为朝鲜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来北京朝觐的朝鲜使者络绎不绝，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阳明学说，甚至早到王阳明生前。

朝鲜学者金世弼(1473—1533)，与王阳明生活年代差相同时。1519年作为使者来过北京，其时王阳明还在世，金可能已经耳闻其学说。《传习录》是正德十三年(1518)，由阳明门人薛侃首刻于江西赣州，也许翌年金世弼在北京就已经得到该书。金逝于1533年，则可以肯定其时《传习录》已经传入朝鲜。金世弼有三首诗表明了对阳明学的看法，其中提到了《传习录》。诗曰：

阳明老子治心学，出入三家晚有闻。  
道脉千年传孔孟，一毫差爽亦嫌云。  
紫阳人去斯文丧，谁把危微考旧闻。  
学蹈象山多病处，要君评话复云云。  
木铎当时余响绝，一编传习亦多闻。  
前头取舍吾心孔，□□西河学僭云。<sup>①</sup>

这三首诗虽然批评了王氏心学，但还是认为王学出入儒释道三家，远不如后来李退溪等人攻击阳明学尽出于禅学之剧烈。这些诗是和另一位朝鲜学者朴祥之作，但朴之原诗今已不可得，只留下“却恐人惊异所云”一句。大抵朴祥于王学所见与金世弼略同，所以金作了和诗。这两人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对阳明学表示正式态度的朝鲜学者。

金世弼之后，朝鲜学者对阳明学之了解越来越普遍，在许多文集中皆可见到关于阳明学与《传习录》的记载，如洪仁佑(1515—1554)在《耻斋先生遗稿》中就提到他在嘉靖癸丑(1553)间向李退溪借阅《传习录》之事：“(六月)初十日。前宵，因景浩公(按：即退溪先生李滉)闻王阳明《传习录》，求见。则其为学，大概务为好异，专以一心为内，天地万物为外。以格致为非，径约为是。故罗钦顺著《困知记》，以攻其失。”<sup>②</sup>由此可见，李退溪之读《传习录》自然还在洪仁佑之前。

在读到王阳明著作的同时，朝鲜学者对其批评也越来越严厉，其间李退溪等大儒自然抨击最力，人所共知，无需具引，更特别的是，到中国来的朝鲜使节甚至于与中国学者当面驳难。嘉靖四十五年(1566)尹根寿以书状官的身份出使北京，与笃信王学的国子监学正陆光祖就王学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辩论，互相不能说服对方，以后又来往书信继续讨论。尹根寿在朝鲜后来官至领议政，地

<sup>①</sup> 《十清先生集》卷之二·诗《又和讷斋》。按：本文所引朝鲜学者之文集皆出自韩国民族促进会出版的《韩国文集丛刊》，以下不另注明。

<sup>②</sup> 《耻斋先生遗稿》卷之二《目录钞》癸丑条所载。

位很高，当时虽作为正使的随员，但因他通华语，故易于与中国士人沟通。在辩论中，一开始双方就亮出自己的观点<sup>①</sup>：

尹问：海内道学，自朱文公、陆象山而后，分而为二：若真西山、许鲁斋，宗朱子；若吴草庐，则为陆氏之学者也。又以皇朝理学名臣言之：薛敬轩、胡敬斋为朱子之学；陈白沙、王阳明为陆氏之学。今之世，宗朱子之学欤？师陆氏之学乎？湛若水尚书，师白沙之学者也，没后有伪学乱正之语。此言何谓欤？幸望示教。

陆答：凡谓之道学，即人心也。人心之谓道，亦谓之学。后世学术不明，外心求道，殊失古先圣宗旨。朱、陆二先生俱深于学者，但朱学失之支离，陆氏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我朝王阳明先生唱致良知之口诀，又象山后一人而已。湛甘泉体认天理之说，亦陈白沙自然之旨。第师没之后，闻见太博，反于本体有加增，不免起世人之疑，谓之为伪，非也。此实我中朝尧舜以来相传嫡脉，外此则谓之外道，异此则谓之异端。如有不同，幸再见教。

接下去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只打得个平手。这场辩论与其后的书信往来，在朝鲜引起很大的重视。但无论是论辩或书信原文，今在中国皆已不存，而在朝鲜文献里依然完整无缺，不啻是研究晚明思潮的上好资料。

两年后，类似的场面再现，但这回不是一对一的辩论，而是一人对一群人的说教。隆庆三年(1569)柳成龙以圣节使书状官到北京，在谒见皇帝之前，等在宣治门内。当时“太学生数百人来聚观，先生问近日中朝道学之宗为谁，诸生相顾良久曰：王阳明、陈白沙也。先生曰：白沙见道未精，阳明之学，专出于禅。愚意当以薛文清为宗耳”<sup>②</sup>。一个外国——而且是受中华文化所深刻影响的朝鲜——使者竟敢在数百名太学生面前指斥当时中国的道学之宗陈白沙与王阳明，不能不说这是十分大胆，而且是不大合乎当时朝鲜所奉行的事大主义政策的，更何况其时阳明学正是如日中天，万一受到围攻岂非不妙？这件事与上一件事一样，大约也轰动了朝鲜。所以李退溪在致柳氏的信中说：“……揆前日尹子固问答(按：即上引尹陆辨难)及魏时亮诸说(按：详见下)，陆、禅怀襄于天下乃如是，令人浩叹不已。然入燕者数多，能遇此等人，作此等话头者亦无几。公能遇数百诸生，发此正论，略点检其迷，不易得也。第吴京欲相送，与之相违，是果为恨事耳。……”

李退溪此信首先对中国正在流行的陆象山学说与禅学(实即指阳明学)表示十分担忧，这是从尹陆辩论与赴朝的中国使节魏时亮的言论中看出来的。

<sup>①</sup> 《月汀别集》卷一《朱陆问难》。

<sup>②</sup> 《西崖集》中《西崖先生年谱》卷之一。

他又对柳氏十分赞赏，认为柳氏的话是为太学生们指点迷津，实在难得。至于吴京，则是其时太学生中之一人，他是反对阳明学的，据说在柳氏说教之后，这位新安（按：即徽州）人吴京“喜而前曰：近日学术污舛，士失趣向，故诸生之言如此，而君乃发正论以斥之，可见深有意于辟异端矣。嗟叹久之。”

从嘉靖到万历间，来中国的朝鲜使臣无不例外地，都十分关心阳明学在中国的风行程度，而且随时随地表达自己不满阳明学说的思虑。这其中，要以许筠所记载的情况最为详细与生动。万历二年（1574），人称荷谷先生的许筠作为书状官来华。六月二十六日行至辽东城，遇四位生员。这四个人是贺盛时、盛寿兄弟与魏自强、吕冲和。后者据说是南宋东莱先生吕祖谦的后裔。因言语不通，而采用笔谈方式交流思想。许筠说：“仆窃闻，近日王守仁之邪说盛行，孔孟程朱之道，郁而不明云，岂道之将亡而然耶。”四人答曰：“本朝阳明老先生，学宗孔孟，非邪说害道者比。且文章功业，俱有可观，为近世所宗，已从祀孔庙矣。公之所闻，意昔者伪学之说惑之也。”由头两句话，即知阳明学说在相当多的一般士人中已经生根，即使曾与朱熹并肩，反对陆氏学说的吕东莱的后代也崇拜阳明学，更为许筠十分不满。

于是许筠遂力辨王阳明之非，并且对吕冲和晓以大义：“……独王守仁者，掇拾陆氏之余，公肆谤诋，更定《大学章句》。其言至曰，苟不合于吾，则虽其言之出于孔子，吾不敢以为信然也。推得此心，何所不至。……夫守仁之学，本出于释，改头换面，以文其诈，明者见之，当自败露，诸君子特未深考之耳。……且吕先生乃东莱贤孙，东莱平日与朱子共排子静（按：即陆九渊）无遗力，而为子孙者，乃不能仰体祖先之意。其可谓无忝乎哉。”但结果并不能说服这四名秀才。于是只能叹道：“古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宗朱门，君耽王学。尔月斯迈，吾日斯征，终无可望于必同也。奈何奈何。”

通过与这四名普通士人的交谈，许筠有无限的感慨与极端的忧虑：“由此观之，则今之天下，不复知有朱子矣。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此非细故也。……呜呼！此道已衰，无复可支吾者。为今之计，将如何哉。其亦尊所闻行所知，而白直加功，不容少懈。朝以没身，则庶不为他说之所摇，而可以不大得罪于圣贤矣。若但与此辈呶呶终日，则恐其无补于事，而徒起纷扰之端也。”<sup>①</sup>

八月初二日许筠一行人到达靠近北京的三河县，遇一国子监生叶本，遂与其交谈，叶氏自言系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许曰：“今闻王阳明从祀文庙，而命其裔袭爵云，未审此事定于何年，而出于谁人之建明乎。”本答曰：“阳明公，浙

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也。天赋挺秀，学识深纯，阐明良知圣学，又有攘外安内之功。穆宗皇帝嘉其绩，封其裔为新建伯。今年，浙江巡按御史论其学真足以得往古不传之秘，宜从祀孔子庙廷，圣旨谕礼部，尚未覆。此其大较也。若欲备知，有阳明文录，又有年谱，可买查之。”

这一回许筠不满足于先前与四位生员的简单谈话，而觉得必须对致良知之学说进行深刻的批判，于是答云：“阳明之所论著，筠尝略窥其一二矣。千言万语，无非玄妙奇怪之谈，张皇震耀之辨，自以为独得焉。……且世之所推阳明者，以其良知一说也，而愚窃惑焉。夫所谓良知云者，乃天理本然之妙也，有不待强作，而人皆知爱其亲敬其长，则凡为学舍良知，别无寻讨处矣。但人之生也，气质物欲，迭蔽交攻，而天理之本然者晦，故圣贤教人，必也居敬以立其本，格物以致其知，然后可以明人伦而成圣学也。今如阳明之说，则是弃事物，废书册，兀然独坐，蕲其有得于万一也，乌有是理哉？此阳明之学所以为释氏之流，而不可以为训者也。吾子其思之。”

但叶氏是信奉王学至深之学子，自然力辨王学并非禅学：“承教谕阳明之学为近于禅者，以其独言良知而未及于良能故也。良知卽体，良能卽用。岂不以体立而用自行乎。若禅则外身心事物，而流于空寂矣。阳明亦建有许多事功可见。要识阳明，须于其似禅而非禅者求之。若《中庸》所谓诚则明矣，此言何谓也？惟其高出于人一步，就以禅拟之耳。至若谓不合吾意者，虽以孔子之言不信，此亦自信以理之意而极言之，非自外于孔子也。若孟子所谓圣人复起，必从吾言。则孟子之心亦未始平矣。故当以意逆志，不可以文害辞也。”

许筠并不服气，进一步剧烈地指斥王阳明，且坚定地宣布自己只服膺于朱子学：“……夫阳明倡良知之说，凡日用应接之事，古今圣贤之书，一切放置，不入思虑，只要想象一介良知，使之忽然有觉于霎尔之顷，此非释氏之远事绝物而何？揆之孔孟之训，同耶异耶？昔者，江西陆子静曾有顿悟径约之说，朱子深排之，不遗余力。若阳明之论，则本诸江西而文之以经书，又加奇险者也。恭惟我朱子扩前圣未发之道，其所论著，盛水不漏，无毫发之遗恨。而《大学章句》，尤其所吃紧着力者也，阳明则乃敢辄以私意，改定章句，妄肆诋诃，无所不至。且刻朱子像，置诸左右。读朱子书，一有不合，则起而杖之云。此何等气象，而何等举措乎？此其为学，固不必深辨，而可见其心术也。吾子乃引孟子之言以饰阳明之谬，不亦误乎。筠平生所愿，欲学朱子，而未之有得。独于背朱子而妄出他意者，则言之及此，不觉痛心。此所以斥阳明为异端，而不容有小避。伏望珍砭可否。”只是叶本并不为其说所动，于是双方约定到通州再次见面讨论。不过这次见面后来并未实现，论战只能不了了之。

但许筠终究还是在中国遇到了知音，发现也有人并不宗奉阳明学，此人就

<sup>①</sup> 《荷谷集·荷谷先生朝天记》上。

是他在通州所邂逅的陕西举人王之符。八月初三，他与王氏对谈时问道：“近世有为陆子静、王阳明之学者，异于程朱所为说，后生莫不推以为理学之宗，先生其亦闻之否？陕西之人，亦有慕仰者乎？”王之符答曰：“陆子静是禅教，王阳明是伪学，吾地方人则皆辟之矣。”许筠听了自然十分开心，遂追问道：“阳明良知之说，是乎非乎？”之符曰：“良知之说，倚于一偏，非伪而何？闻阳明聚徒讲学于家，一日，阳明之妻出外，诉其门第曰，你何敢相率而师矫伪者乎？门第由是多散去。若圣贤则岂有不能刑家，致有此事之理乎？然则阳明之学，决知其文饰于外者多矣。迩来请从祀者，徒以阳明之弟子多在朝者，故欲尊其师，而廷议或不直之。是以巡按御史上本已久，而礼部尚未定夺矣。”

半个多月后的八月二十日，许筠趋谒国子监，又遇另一位知音，即应天府高淳县监生杨守中。他问杨说：“王阳明之学何如？”杨曰：“阳明单说良知，正是伪学。”又问曰：“然则今日何以推崇阳明者众，至欲举从祀之典乎？”杨守中及边上两三监生答曰：“此亦非天下之通论。南人皆尊阳明，而北人则排斥之。故从祀之议，今尚未定也。”

从以上所举诸例可知，自阳明学流行以来，受到朝鲜学者的强烈抵制，不但在朝鲜国内如此，而且将此一抵制思路发散至中国。他们不但在朝鲜国内坚守朱子学，而且企图以之取代颇成风靡形态的晚明境内的阳明学。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决绝，言辞之剧烈，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同时这些例子又让我们了解到阳明学在明朝本土的盛行情况，可以说从高官到一般士子都有很广大的基础，而这些史料都是在中国文献中看不到的，其可贵自不必言。如陆光祖，官至吏部尚书，《明史》有传，但该传丝毫不及其学术观点，也找不到有其他资料证明他是王学的坚定信徒，如若没有尹根寿的记述，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上陆光祖与其有辨难之事。至于一般的中国士人对王学的态度我们更不得而知，只有由上述一些细致的记载，我们才会明白这些历史的细节。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朝鲜既普遍以阳明学为异端，则王守仁其人亦被视为洪水猛兽，只要是与自己敌对的人，都可以随便被扣上王阳明的帽子。就连李退溪那样坚定的反阳明学者，因与当轴诸公不和，其行为也被首相比作是王阳明的行止<sup>①</sup>。

<sup>①</sup>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书·答金而精》：“王守仁学术，尝略窥破，未知其行止如何，又未知其行止相似处的在何处耶。可惧可惧。”（考证云“王守仁行止相似”，案是时先生之归，首相至比之王守仁之行止，故先生之言如此。又见上答郑子中书。答郑子中书又提到首相之怒，是时当轴诸公将其比王守仁也。）

## 二、中国士人在朝鲜宣扬阳明学

明朝使臣去朝鲜的人数与朝鲜入华使节的数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仍然有一定数目。而万历壬辰年（1592）以后由于援朝抗倭，进入朝鲜的中国学者相对较多。与前述现象成鲜明对照的是，到达朝鲜国内的一些中国士人，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任何场合都力图宣扬阳明学，与朝鲜学人意见相左，使朝鲜学者忧心忡忡，甚至对宣扬企图加以抵制。

隆庆元年（1567），翰林院知检讨许国、兵科给事中魏时亮充登极使前往朝鲜颁诏，据其时朝鲜学者奇明彦致李退溪书云：“（许国、魏时亮）两使皆禅学，难可与言。”<sup>①</sup>又前引李退溪答柳成龙书云：“揆前日尹子固问答及魏时亮诸说，陆、禅怀襄于天下乃如是，令人浩叹不已。”<sup>②</sup>前一条之“禅学”即指王学，后一条之“陆禅”自是指陆学与王学。魏时亮自然是王学门徒，观其后来力主王阳明配享孔庙便知。然许国亦宗王学，前此似无人知晓。魏时亮不但自己信奉王学，来到朝鲜后还进行了一番宣传，即上引的“魏时亮诸说”。只是到底如何宣传，现在尚未查到有关资料。

万历二十年以后不少中国士人因参与朝鲜的卫国战争，而进入朝鲜本土。有些人虽是以武将身份去的，但其本身仍是文士出身，深邃于儒学，因此在戎事之余，就参和到阳明学与朱子学的争执中去。其中最突出的两人是宋应昌与袁黄。

宋应昌是兵部左侍郎，万历癸巳年（1593）以经略身份到朝鲜。甫到之时，即正式要求朝鲜朝廷选送“书筵讲官文学之士数三人，来候幕中，讲论道学”。于是司书黄民慎，文学柳梦寅及李廷龟获选前往。宋对三人“礼遇甚隆，军务之暇，间日相接，辄讲《大学》旨义”。以宋应昌之意自然是要通过对此三人宣讲阳明学而达到影响朝鲜朝廷，以至于影响朝鲜学者的目的。按李廷龟的记述，宋应昌“每于讲时，力诋程子以亲民作新民之误。至曰《大学》一篇大义，都在亲民上”。《大学》文本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句，到底应是亲民还是新民，是朱子学与阳明学争辩的重点。宋应昌抓住此点以攻击程朱之学而宣扬阳明学。但朝鲜这三位学士却力守朱子学，毫不让步。好在宋应昌并不以势压人，而是建议将双方的不同意见编写下来，成为《大学讲语》一书，“自经一章至十章，逐章作注”，做成如宋代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那种形式的书。

<sup>①</sup> 《退溪先生文集考证》卷之四《书》。

<sup>②</sup>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书·答柳而见庚午》。

于是李廷龟等人先做第一章讲语以呈，随后宋应昌自制一篇，“令从事参谋官河间府通判王君荣书而示之。厥后多事，每令通判书示。到处必会于乡校明伦堂，辨讲异同，辞说甚多。……所著逐章讲语，经略刊刻为一部书，送于行在，亦分送一件于余等”<sup>①</sup>。这本记录中朝学者对阳明学不同意见的《大学讲语》虽然是在中国刊刻的，今天却不见于所有公私藏书之中，甚而不见于著录，但却保留在朝鲜文献里，与上述的尹根寿、陆光祖辨难的资料一样可贵，直可作研究思想史者的重要资源。

袁黄是另一个在朝鲜宣扬王学的重要人物。他入朝前的职务是兵部主事，到朝鲜之后，颇有对朝鲜官员宣讲王学精髓的迫切要求。他先对崔兴源其人说：“中国昔时皆宗朱元晦，近来渐不宗朱矣。”而后，又以其所著书《为阐明学术事》示于朝鲜官员，并说：“自程朱之说行，而孔孟之道不复明于天下，天下贸贸焉聋瞽久矣。我明兴理，理学大畅，近日圣天子玄鉴朗悟，契心尧舜，当朝宰辅，皆是大圣大贤，相与揭千古不传之秘，尽扫宋儒支离之习，惜汝国僻在一隅，未得流布。”同时又摘示朱子《四书集注》十余条，予以批评，最后说：“吾辈今日工夫，只学个无求无着，便是圣人，至简至易，较之朱说，孰非孰是？”<sup>②</sup>显示出他对宣传王阳明学说的执着。

但其时袁氏面对的仍是一批坚奉朱子学的朝鲜学者，他们对袁氏的进一步宣讲的打算敬谢不敏，然又碍于袁是天朝臣子，不敢当面拒绝，只能致书曲为之谢。有两个文集保存了对袁黄其人的介绍与婉辞听其宣讲的信件，很有些意思，其一载于成淳《牛溪集》（答袁黄书前还有一个小序，尤为别致），引如下：

**《答皇明兵部主事袁黄书》：**袁书力排程朱之学，其书专主禅、陆，行朝诸公议所以酬答而难以措辞，共推先生，辞不获，乃起草，袁见之默然。未几，以学术邪僻、左道惑众，逢科辟而去。癸巳春：“小邦僻在遐远，学术通方，常仰中国书籍以为口耳之资。伏遇皇朝颁赐《五经四书大全》，表章先儒之说，列于学官，班行天下，小邦之人，无不诵习而履行，以为此说之外无他道理也。今兹小邦不天，妖贼椓丧，老爷合下受命来讨，费画军谋，军旅之外，旁及讲学之事，谆谆开导，第缘某等未学肤浅，思虑荒芜，其何能言下领悟，发微旨极，以仰承老爷之至恩乎！今者邦国垂亡，上下皇皇，凡在陪臣久困行间，平日所知，失亡殆尽，不得细绎旧闻以求正于有道，伏愿老爷俯鉴微悰，哀而怜之，讲学之事，请俟他日。”

这样直白的，不留情面的推辞，使得袁黄黯然神伤，不得不放弃宣讲的企图。

<sup>①</sup> 本段引文皆见《月沙先生集》卷之十九《大学讲语》上“序”。

<sup>②</sup> 见成淳《牛溪集·书皇朝兵部主事袁黄著书卷后》。

袁黄即在中国，今天也不大会有人认识，但在明朝却有一定知名度。他于十四年中进士，曾任河北宝坻知县。万历二十年，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日本侵略朝鲜，明廷派兵援朝，蓟辽经略宋应昌上疏请袁黄到军营赞划，袁遂入朝鲜，并在平壤战役中有上佳表现。不过袁之有名主要还在于《袁了凡家训》与《袁了凡纲鉴》<sup>①</sup>两部书，除此之外，后世知其为王学的忠实追随者并不算多，更不知他打算将王学推广到域外。其实袁黄最重要的反对程朱的著作据说是“史论及四书”，但因其“极诋程朱，至尽窜注解，更以己意”，故“坐非儒见黜，焚其书”<sup>②</sup>。因此我们今天已看不到袁黄完整地反对程朱之学的议论，只有他在朝鲜留下的片言只语还弥足珍贵地保留下来，让我们看到思想史冰山下的一小角。

### 三、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晚明与朝鲜均非铁板一块

由上述诸例看起来，似乎晚明嘉万之际，在中国尽是阳明学的天下，而在朝鲜则是朱子学的世界。其实也不尽然。阳明学在晚明的中国虽然风靡一时，但仍然有不少反对者，这从第一节所引诸例以及明代遗留至今的许多文献可以看出，不必重复。这里要说的主要是王学在朝鲜的情况如何，是不是就没有一个人信奉了呢？不然。同样也有人接受了，或至少是将信将疑，并不反对的。这首先就要说到朝鲜国王宣祖。他数十年间均不以臣下攻击阳明学为然，表现出对阳明学的一种同情。

据柳希春《眉岩先生集》卷之十六《经筵日记》载：万历元年癸酉（1573，朝鲜宣祖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左相等更迭进言，语及王守仁自圣无忌，诋訾朱子，中国好怪者，从而和之。陈建著《学蔀通辨》，此实辟异端之正论，宜令校书馆开板，又于湖岭亦然。上曰：‘王守仁亦有材气建功业。’臣希春进曰：‘守仁资性狼戾，强愎不逊，谓五常有亦可无亦可，划而去之亦可。又称秦始皇焚书，以为合于孔子删述之意。又毁朱子著书立言曰，惨于洪水猛兽之灾。其为邪说甚矣。’上曰：‘谓之邪，无乃过乎。’”可见李朝宣祖对王阳明的功业与学说是颇为欣赏的，只是满朝大臣风靡景从朱子之学，不能不将赞同阳明之口气放缓和些。时宣祖年二十岁，也许因为是年轻人，所以好新奇之学。但十五年后，他的观点依然如此。

据上文提到的到北京舌战群生的柳成龙的年谱记载：万历十六年“先生赴召，上引见论学。因问及王阳明致良知及心即理之说，圣意不甚以为非。”又据该年谱卷三附录郑经世所撰柳之行状曰：“戊子冬，以刑曹判书召还。上即引

<sup>①</sup> 《袁了凡纲鉴》的正式名称是《鼎嶽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历史大方纲鉴补》，今存有万历三十八年刊本。

<sup>②</sup> 《罪惟录》列传第十八李贽、袁黄条。

见，问及王阳明学术，颇有倾向于致良知、心即理等语，不甚觉其非。”此时宣祖已三十五岁，思想已经定型，仍不以王学为非。虽然经柳成龙剖析辨别，不免表面上认为“自有孔孟程朱，何可他求也”<sup>①</sup>，但内心不见得服帖柳氏之说，因为七年之后，他召见庆安令柳瑶时，再次询及其对王学的态度。

李朝《宣祖实录》载：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庆安令瑶，以请对事上疏。上引见瑶。……上曰：‘此言非偶然。且尔即云学书，则心学亦为之乎？’瑶曰：‘臣尝闻治心之人，无不往见，今之名士，亦皆遍识。如柳成龙往来退溪门庭，有学而未能详知；金谨恭，乃李仲虎弟子，而尝教授生徒，臣尝与之从游矣。’上曰：‘金谨恭、李仲虎，予初闻之。’瑶曰：‘虽中朝人，若有心学，则愿见而不得。王守仁之书，亦尝喜见矣。’上曰：‘所见必高矣。守仁何如人耶？’瑶曰：‘其言云晦庵之心，与某同；而格物之说，与程子有异。’上曰：‘阳明之说是乎？’瑶曰：‘臣尝见阳明及象山书。臣之心，以为好矣。’上赐瑶内馔。”

可见宣祖一直对王阳明学说有好感，二十多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关注王学。大概也因为正学到底是程朱或是陆王这个大问题在宣祖朝始终没有解决，所以终宣祖一代，在朝鲜孔庙里未增加哪怕一名配享学者，直到后来的光海君时期，才以朱子学为正宗而一举增补数人。而与宣祖对话的这个柳瑶正是朝鲜少数一些倾心阳明学说的学者官员，他甚至敢于直接上书给宣祖赞扬阳明学，正好宣祖亦有同好，故而立即召见。但柳对阳明学之完整见解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了。只有批评柳的文字还可以看见，如郑晔就上札给宣祖剧烈指斥柳瑶言论之非：“彼瑶一狂惑丧心人耳，有何见识？媚师鄙夫，尚不知悟，岂能知阳明学术之邪正乎？固不足与较。而臣等之所甚惑者，以殿下博大之学，高明之见，严辨之，痛绝之，无使伪乱真邪害正可也。而反与之询问其见，酬答其言，有若以瑶之言为可者然。此虽出于虚己听言之盛心，而臣等恐斯言一播，士向靡定，其流之祸，有不可胜言者也。”<sup>②</sup>

<sup>①</sup> 见《西崖集》中《西崖先生年谱》卷一及卷三。

<sup>②</sup> 《守梦先生集》卷之五《攻柳瑶劄》。又《直斋集》卷之七《书·与朴大叔铎》○戊寅载：“昔在宣庙朝，有柳瑤者，颇习阳明之学，至于上章盛称，即赐召对。其时郑守梦陈劄痛斥，不遗余力。彼柳瑤一言，何足为世轻重，而守梦犹恐其说之或行。其在辟邪之道，不得不如此也。”宣祖当时勉强接受郑晔的剖析，但内心仍倾向于王阳明。故两年后，又明白赞扬了王阳明之事功。参见《宣祖实录》载：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辛酉，上御别殿，讲《周易》。……弘微曰：“先儒于格物致知之论，择之不精，至于互相诋毁。近闻中原学徒，一趋于象山之学，而不崇程、朱云矣。”上曰：“近者亦有如此之习乎？”宋言慎曰：“非但不崇，至于文字间，不用程、朱。时尚如此矣。”上曰：“人言：‘王守仁，内修而外则放僻。’果若如此之人，谁其尊之？”弘微曰：“论其学术之弊，则心不正，而见理处有误也。”上曰：“学术不须论，而可取者其用兵。使此人当此贼，则可得破灭乎？”弘微曰：“胜败则未可定知，举措之间，必有所为矣。”

柳瑶之后，明清之际还有一个朴世堂（1629—1703），也是不满意朱子学的朝鲜学者。据《礼曹判书俞公行状》所载：“朱子经书批注，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而今者朴世堂敢以朱子为可毁也，批注为可改也。割裂章句，颠倒义例。其乱经悖常，真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也。”<sup>①</sup>依传统观点，朴世堂思想的确比较出格，他既注《道德经》，又注《庄子》，已为时人所警告，因为纯儒者不当喜好老庄之学。虽然他又有《四书思辨录》之著，是儒学研究著作，但其中有与朱子学不同意处，也为时人所不满。晚年因为被人诬告挟嫌报复朱子学者，而差一点被流配恶地。<sup>②</sup> 其学术观点除专著《思辨录》等之外，又可参见《西溪先生文集》。

延至清代康熙年间，又有郑齐斗（1649—1736）其人推重阳明学。郑有《霞谷集》传世，收有《门人语录》，其中“李匡臣曰：先生初年从事于考亭之学（按：即朱子学）。……中年得阳明书读之，至其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乃有发周、程所未发者。遂乃跃然省悟，专心致知于此，非故欲求异于考亭，只是于根本大体与功夫入门处，不能无离合繁简之差而然。然尊信考亭，亦未尝不笃。其他文义之明当处亦未动一字，及门者如欲以章句集注学之，则亦授之以章句集注，不必以阳明说引诱。盖以其笃实用工，则以彼此不害为同归一致故也。然而若有请问阳明说者则亦必随其所叩，竭两端而亹亹，此先生为学之始终主意也。世之涂听道说，不知考亭、阳明之为何道何学，视若儒释冰炭之不同，斥阳明为异端，讥先生为异学者，固不可与议。而先辈长者如明斋、南溪、明谷、诚斋诸先生盖尝忧之，而亦恐于阳明考之不深，而其忧之也过矣。至于门人后学不免承沿旧见，未能真知阳明之不为异端，而必欲弥缝掩护，或以为先生何尝为阳明学云尔，则是亦诬也”<sup>③</sup>。

此段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郑齐斗的学问取向之道，既欣赏阳明学，又不欲弃朱子学，有一点想作调和的工夫。但其时朱子学不但在朝鲜仍占上风，在中国也早已恢复了正统的地位。因此如郑齐斗之逆势而行者也并不多见，故其个别门人或有欲掩盖其好阳明学者理由也在此。而李匡臣则表明应该光明正大地宣称郑齐斗是信奉阳明学的。有趣的是，其时的朝鲜国王英宗并不因其崇尚阳明学而见斥，相反地却给他升了官<sup>④</sup>。

此外，明确表示对朱子学有商榷余地的也有人在，如《弘斋全书》引提学臣金鍾秀《癸卯录》云：“尊德性道问学，要之不可偏废，少偏则有差。而以知行之

<sup>①</sup> 《雷渊集》卷之二十五。

<sup>②</sup> 《西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附录·年谱》。

<sup>③</sup> 见《霞谷集》卷十一。

<sup>④</sup> 《英祖实录》：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丙申：“擢郑齐斗为右赞成，中批也。…齐斗素为阳明之学，而为人恭谨而已，故世目为乡愿，而上欲宠异之，有是除。”

分言之，讲论不足当真知。穷格到底，方是真知。穷格之工，既到十分，则自能行将去。凡行有未至者，究其本，皆由于知之未真。人苟知不善之不可为，真如乌喙之不可食，则必无为不善之理。但主穷格者，其弊或归于忽践履。朱子法门，则少无所偏。而朱门末学，已有口耳记诵之弊。象山之学，盖亦有激也。”<sup>①</sup>此是对朱子学的温和批评。

以上柳、朴、郑等人既有不满朱子学与赞同阳明学的思想，也就证明朝鲜的朱子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正学与异端之并存，至于何为正何为异，则有可能随时代而变迁（上引李匡臣即指斥有人“未能真知阳明之不为异端”），此乃学术史思想史之通义也。

#### 四、几句结语

阳明学在晚明的兴起、发展、变异以至衰落，是学术史思想史上一个极重要的课题<sup>②</sup>，非如我外行者所能言。本文只是从文化交流史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与朝鲜文化长期接触后所产生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古人有云：礼失求诸野。从文化的发生与传播来看，在东亚，中国自然是文化的核心，而朝鲜、越南与日本均可看成是外延地带，也就是野。核心地区的文化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会对周边地区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要有一定过程的，于是在共时的平面上，核心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景观就呈现出新与旧的强烈对比。所以在核心地区已经消失了的文化必须到周边地区去寻找。但对于朝鲜为何始终坚持朱子学，除了礼失求诸野的解释之外，应该还有朝鲜自身学术理路的发展与朝鲜政治形势与党派斗争的原因在，这就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只能敬请大雅指教。至于不少朝鲜学者虽然不一定赞成阳明学，但却盛赞王阳明之事功与文章以及心学以外的其他学术见解，但已在本题之外，就不涉及了<sup>③</sup>。

<sup>①</sup> 见《弘斋全书》卷百六十一《日得录》文学“一”。

<sup>②</sup> 即在朝鲜，阳明学的是非在学术史上也看得很重，以至于以其作为策题的示范。参见《西堂私载》卷之四《杂著策题》及《沧州先生遗稿》卷之十五《杂著·执策问》二“卫道之策”。

<sup>③</sup> 如《鹿门先生文集》卷之七书《答李平瑞》：“王正月。春秋一书中大疑。王阳明直据春秋经文为断。其言直截明快。无复余蕴。不可以其人而废之也。其他证左之明白者，亦非一二。”又卷之十五《杂著·经义·尚书》：王阳明曰书云元祀十有二月，则商之不改月可知。春秋云春王正月，则周之改月改时可知。此言极明快直截，更无许多说话。又如《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与李士兴书：“常爱王阳明之言。有曰语到快活时，必截然能切默得。意到发扬时，必翕然能收敛得。喜怒嗜欲蜚腾时，必廓然能消化得。为天下之大勇，此果克治之要法也。”又如《弘斋全书》卷百七十三《日得录》十三·人物“三”：“历代人物，出处之正大，事业之磊落，西汉有张子房，蜀汉有诸葛亮，唐有李长源，皇明有王阳明。此四人，不止挺拔一时，竟可掩覆千古。”（直阁臣金祖淳《癸丑录》）

## 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

——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

黄时鉴（浙江大学）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从周边看中国”，旨在借助“异域之眼”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虽然有这么一个主题，但其范围还是非常广泛，这从先前发布的论文目录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做的这个题目只能说是一种比较研究，仅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纳入会议的主题。

三年前，我和龚缨晏合作撰写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问世，但总觉得意犹未尽，脑子里一直转着好几个问题。问题之一是，书中写到了利氏地图在中韩日三国的影响，当时已经感到它们是不同的，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本文就想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尝试。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上三国的“世界”观念的差异和演变来进行考察。总体上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牢固的传统“天下”观使利氏地图熔入明清地图的中华中心主义大统；在朝鲜，变异的“天下”观仍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总”，利氏地图传入较早却影响有限，而特殊的“天下图”得以产生和流传；在日本，利氏地图虽也遭到拒斥，但实际上得到较为深广的“受容”，传统的“三国”观后来也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念。

中国古代只有“天下”的观念。“天下”这个词，可以说是非常广义的。但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它的含义却是很有局限的，所谓“天下”是指君临所及的王土。当然对这个“天下”的认知也是逐渐扩大的。也有古人将“天下”扩展到尚未认知的以至想象的地方，为穷荒，为海外，为六合，但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